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中国军事典籍外译研究专题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兵学术语德译研究

——以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福克译本为例

许文娟,张华南

(大连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典籍,其中的兵学术语彰显着中华军事智慧,也影响着世界战略哲思。《孙子兵法》德语译介已有110多年的历史,并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选取《大中华文库·〈孙子兵法〉(汉德对照)》译本和吕福克(Volker Klöpsch)译本两个典型译本,基于语料库,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词汇丰富度、词汇密度和翻译策略三个维度研究其兵学术语翻译风格并探究其差异成因,旨在推动《孙子兵法》兵学术语德译的完善发展,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提供借鉴与思考。

关键词:《孙子兵法》;德语;语料库;兵学术语;翻译风格

中图分类号: E 892; H 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1.004

2024年1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中强调,学者应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见,古典学及其研究在全球文化对话中意义重大。《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典籍,素有“兵学圣典”、“兵经”之称^[1]。它象征着中华军事智慧,也影响着世界战略哲思。正如德国学者安德烈·汉普夫(André Hampf)所言,阅读孙子及其著作《孙子兵法》是研究中国军事战略最主流的途径^[2]。

《孙子兵法》一书中的兵学术语构建起了辉煌的军事科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其军事思想精髓,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和文化密切相关^[3]。许多兵学术语为孙武原创,在德语中往往难觅确切对应,译者需在语言转译与文化阐释间寻求平衡。因此,如何精准翻译兵学术语,传达作者军事哲思,再现文化内涵,是译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传播中国军事思想、促进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关键环节。

《孙子兵法》相关翻译研究多集中于英语译本,对德语译本的研究较少。现有为数不多的德译研究或聚焦《孙子兵法》在德国的传播,或以功能翻译学为视角对比分析《孙子兵法》德译本,少有研究专注兵学术语的翻译。而且,研究方法偏重定性分析,缺少结合语料库进行的量化研究。基于此,本文先爬梳《孙子兵法》的德语译介历程,后借助语料库,分析《大中华文库·〈孙子兵法〉(汉德对照)》译本(以下简称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福克(Volker Klöpsch)译本(以下简称吕译本)中兵学术语翻译词汇的计量特征及翻译策略,发掘两译本翻译风格差异及其成因,为后续兵学术语翻译完善提供参考。

一、《孙子兵法》的德语译介

《孙子兵法》在德国传播逾百年,译本众多,影响深远。1910年,《孙子兵法》首个德译本《中

收稿日期:2024-12-24

第一作者简介:许文娟(1997—),女,山东滨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与社会文化、外语教学研究。

E-mail:wenjuanxu23@163.com

国古典兵家论战争的书》(Das Buch vom Kriege der Militärklassiker der Chinesen)在柏林出版,由德国汉学家、翻译家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a)翻译,献给当时的德军参谋长封·莫尔特克(V. Moetke)将军^[4],自此开启了《孙子兵法》在德国的传播之路。

20世纪中叶,《孙子兵法》的德译工作延续了首译本对军事应用的关注。195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了由伊娜·巴尔西洛维亚克(Ina Balcerowiak)翻译的《孙子兵法》新译本。该译本由俄译本转译而来,被国防部列为东德军事院校的重要教学材料,进一步推动了《孙子兵法》在德国军事领域的应用与传播。

20世纪下半叶,在中德建交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愈发重视东方智慧,《孙子兵法》德译本数量迅速增长,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少有五个德语译本相继出版,包括H·D·贝克尔(H. D. Becker)译《孙子兵法十三篇》(1972)、汉斯-基督·皮斯特(Hans-Christian Pilster)译《孙子兵法》(1974)、克劳斯·莱尼茨(Klaus Leibnitz)译《孙子兵法》(1989)等。20世纪90年代,《孙子兵法》的译介、传播进入高峰期。十年间,共有11部德语版《孙子兵法》问世,其中4本德语新译本、3本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专著和4本应用类书籍^[5]。

步入21世纪,德国学界对中国文化与经典著作的钻研持续深入,《孙子兵法》德文版出版态势愈发蓬勃。据统计,截至2015年,德国出版的《孙子兵法》相关德语著作数量多达42部,较20世纪出版量翻了一倍有余^[5]。笔者在德国国家图书馆(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DNB)以“die kunst des Kriegeres”和“Sunzi 或 Sun Tzu”为检索词发现,2016年至今,共有16本《孙子兵法》相关德语图书出版,古老的东方智慧在莱茵河畔持续熠熠生辉。

与德国出版界对《孙子兵法》德译工作的高涨热情相比,国内对该经典的德语译介显得颇为冷清。1994年,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由钟英杰翻译完成的《孙武兵法 孙臆兵法》德汉对照版本,这是我国第一部自主翻译的德语译本,具有开创性意义。2007年,外文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该译本,并在新版本中删除了中文原文。

2009年,钟英杰与格雷戈尔·克努塞尔(Gregor Kneussel)合作翻译的《大中华文库:〈孙子兵法〉(汉德对照)》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经笔者比对,该译本仅对个别词的翻译进行调整,整体上与前述译本差异不大。

二、译本选择

译本选择是翻译研究的基础环节,直接影响分析的针对性和研究的科学性。本文选取的两译本均为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德语译本,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策略和学术取向,可为本文的翻译比较研究提供丰富案例。

《大中华文库:〈孙子兵法〉(汉德对照)》于2009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由钟英杰与格雷戈尔·克努塞尔合译,著名孙子研究专家吴如嵩、吴显林负责校释。译本以南宋《十一家注孙子》为中文工作底本^{[6]21},是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大中华文库》多语种项目之一。该书主要译者钟英杰是中国资深德语译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曾翻译《史记》、《孙子兵法》等多部经典著作,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

吕福克所译《孙子兵法》(SUNZI, Die Kunst des Kriegeres)于2009年由德国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出版,至今已再版九次,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孙子兵法》版本之一。该译本由中文源语翻译而来,还参考了银雀山汉墓所出土的最古老的《孙子兵法》竹简本^[7],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译者吕福克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担任《大中华文库》“唐诗选”、“宋词选”德方主编及主要译者,其译文在德国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三、研究设计

(一)兵学术语

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用来正确标记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8]。兵学术语通常是表述军事概念的词或词组,用于标记我国古代军事领域中的事物、现象和特性等^[9]。由于目前界定标准和统计方法的差异,《孙子兵法》中的兵学术语数量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依据裘禾敏对兵学术语的分类方式,将兵学术语及其数量界定为:参照中华书局1962

年影印出版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里出现的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专门名词性词汇,包括兵制、兵器、兵略、地形、兵技和治军六类兵学术语,共计 99 个^[10]。其中,兵器类兵学术语“兵”有四个义项^[10],兵略类兵学术语“五事七计”包含十二个义项,治军类兵学术语“五危”包含五个义项。为更详尽地研究兵学术语在两译本中的德译情况,本文将每个义项分别看作一个兵学术语,最终确定本文研究对象为 117 个兵学术语的德语翻译。

(二)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语料库分析方法,以兵学术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探究两译本翻译风格差异,具体研究问题为:

(1)两译本对兵学术语的翻译在词汇层面的计量特征有何差异?

(2)两译本对兵学术语的翻译策略有何异同?

(3)两译本翻译风格差异的成因是什么?

(三)语料库与数据处理

首先,笔者依据裘禾敏的兵学术语分类方法,提取两译本中 117 个兵书术语的翻译词语,分别建立语料库。随后,借助 WordSmith、TreeTagger 与 AntConc 等软件统计语料信息,完成类符、形符及实词等数据分析。在综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词汇丰富度、词汇密度和翻译策略为研究参数,对所获语料数据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四、兵学术语翻译风格对比分析

(一)词汇丰富度

类符指文本中共出现了多少种词,形符指文本中词的总数^[11]。类符形符比(type token ratio),即文本中不同词的数量和总词数量的比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料的词汇丰富度。类符形符比值越高,说明文本的词汇越丰富。借助 WordSmith 软件对两个语料库中的语料信息进行统计,可得表 1 中类符、形符及类符形符比数据。

数据显示,大中华文库译本类符形符比值为 56.40,吕译本的相应比值为 61.14。可见,吕译本兵学术语翻译用词更多样,词语变化程度高

于大中华文库译本。

表 1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兵书术语翻译类符、形符及类符形符比

语料库	类符/个	形符/个	类符形符比/%
大中华文库译本	229	406	56.40
吕译本	214	350	61.14

以兵略类兵学术语“众寡”,地形类兵学术语“圯地”、“交地”、“通形”的翻译为例,看两个译本的差别,见表 2。

表 2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兵学术语示例

兵学术语	兵学含义	大中华文库译本	吕译本
众寡	大部队、小部队	(Die Verwaltung) einer großen Armee, (gleich der) einer kleinen Armee	Umfangreiche Truppenverbände, kleinere Truppenteile
	难于通行的地区	(in einem) schwer zugänglichen Gebiet	(in) schwierigem Gelände
通形	四通八达的地区	zugänliches Gelände	(von) zugängigem Gelände
交地	道路纵横便利的地区	zugänliche Gebiet	durchgängiges Gelände

“众寡”见于“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势篇》),指大部队和小部队。《孙子兵法》作为兵书,不可避免地会多次提及兵、军、军队等。如何根据语境对这些重复出现的核心术语进行细致区分,在保证翻译精准性的同时避免术语冗余,是译者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对此,大中华文库译本对“众”和“寡”选用同一名词“Armee”(军、军队)为中心词,通过变化定语“groß”(大的)、“klein”(小的)实现大小部队的区分。然而,这种处理方式虽能传达基本含义,但在术语精确性和区分度上显得较为不足。相比之下,吕译本通过使用复合词“Truppenverbände”(营,大部队)和“Truppenteile”(单元,部队)来翻译“众寡”,有效避免了“Armee”(军、军队)的重复使用,提高了文本可读性。

“圯地”、“交地”和“通形”三个地形类兵学术语的中心含义都与“通”相关。大中华文库译本

对这三个术语选用同一单词 zugänglich(可进入的)进行翻译,保持了相同含义翻译的一致性。而吕译本则通过省译和同义词替换的方式,避免了词汇的重复使用,对义同形不同的术语进行区分,增强了译文的词汇丰富度。

(二)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指在语料库中实词的形符数占总形符数的比例^[12],是反映翻译风格、衡量文本可读性的重要指标。实词指具有实际意义的词,包括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一般而言,文本中实词所占比例越高,文本的信息量越丰富。为此,笔者使用 TreeTagger 软件对两个语料库进行词性标记,随后将赋码完成的语料分别导入 AntConc 软件,统计出两译本中的实词类符数量,见表 3。

表 3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实词类符的频次与密度对比

实词	大中华文库译本		吕译本	
	频次/个	密度/%	频次/个	密度/%
名词	151	37.19	125	35.71
实义动词	56	13.79	50	14.29
形容词	56	13.79	43	12.29
副词	4	0.99	6	1.71
总计	267	65.76	224	64.00

统计数据显示,大中华文库译本中实词类符数量为 267,词汇密度为 65.76%。吕译本中实词类符数量为 224,词汇密度为 64.00%。可见,在翻译兵学术语时,大中华文库译本的实词类符比更高,词汇密度更大,承载的信息更丰富。

以兵略类兵学术语“度”、“量”、“数”、“称”、“胜”为例,看两个译本的差别,见表 4。

“度、量、数、称、胜”见于“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形篇》),系衡量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几项重要指数^[10]。大中华文库译本在翻译时对“度、量、数、称、胜”的具体指向对象进行了补充说明,描述更为详尽,便于读者全面领会孙武的用兵策略。相较而言,吕福克的译文更为简洁凝练,增强了术语的通用性,降低了阅读难度,更易被非专业读者接受和理解。

可见,在翻译兵学术语时,大中华文库译本注重对源语文化的保留,通过补充说明和详尽解

释,力图展现术语的文化深度和具体指向。吕译本则注重对目标语文化的适配,以简洁凝练的语言传递核心概念,增强术语的普适性和可读性。

表 4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兵学术语示例

兵学术语	兵学含义	大中华文库译本	吕译本
度	度量土地面积	die Größe des Gebietes	das Ausmaß
量	计量物质资源	die Menge der Ressourcen	die Menge
数	计算兵员的多寡	die Anzahl der Truppen	die Anzahl
称	衡量敌对双方实力状况	die militärische Stärke	das Gewicht
胜	战争胜负	die Chance des Sieges	der Sieg

(三) 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而采取的宏观规划和方法。为探析两译本的翻译策略,笔者将从归化和异化角度分析两译本中兵学术语的翻译方式,了解译者在面对中德文化差异时的选择与妥协。

1. 归化异化策略使用频率 归化策略指使译文尽可能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异化策略指尽量向源语靠拢,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表达方式。基于此,笔者对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兵学术语的翻译策略进行辨认,通过统计量化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使用频率,见表 5。

表 5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兵学术语归化与异化策略使用频次对比

兵学术语	大中华文库译本		吕译本	
	归化	异化	归化	异化
兵制(10)	9	1	10	0
兵器(20)	18	2	20	0
兵略(31)	31	0	29	2
地形(25)	18	7	23	2
兵技(21)	20	1	20	1
治军(10)	10	0	10	0
总计(117)	106	11	112	5

统计数据显示,两译本对兵学术语的翻译均以归化策略为主,异化策略为辅。具体而言,大中华文库译本有 11 个兵学术语采用异化策略,吕译本中有 5 个,大中华文库译本异化策略的使

用频次高于吕译本。这一差异映射出两译本在文化传递中的不同立场与理念:大中华文库译本倾向于保持源语的文化特征,增强文化的“陌生感”;吕译本偏向于顺应目的语文化习惯,减少文化冲突。

2. 归化策略比较 归化讲求以目的语语言文化为归宿,向目的语读者靠拢^[13]。表 6 以兵器类兵学术语“兵”、“驷”,兵略类兵学术语“奇正”、“夺气”为例,揭示译者如何在保留源语信息的同时,调整翻译以适应目的语文化与语言习惯。

表 6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的归化策略示例

兵学术语	兵学含义	大中华文库译本	吕译本
	战争	Krieg	der Krieg
	士兵、军队	die Ausrüstung	die Truppen
兵	用兵之道	Alle Kämpfe	die Kriegführung
	兵器	die Waffen und Ausrüstungen	die Truppen
驷	量词,辆	省译	省译
		(die Anwendung)	(von)
奇正	变法与常法	der Überraschungs und der normalen Taktik	überraschenden und regulären Operationen
夺气	打击士气	die Kampfmoral dämpfen	die Moral rauben

“兵”作为贯穿《孙子兵法》始终的重要术语,在书中共有四个义项:(1)战争,见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2)士兵、军队,见于“法令执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3)用兵之道,见于“兵者,诡道也”;(4)兵器,见于“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计篇》)。正确理解“兵”的不同含义,是读者把握原文的关键。对此,两位译者均运用归化策略,结合语境对“兵”这一术语进行意译,避免了古汉语一词多义对读者造成的阅读障碍,拉近了中华典籍与西方读者的距离。

“驷”见于“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作战篇》),原指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后通指四匹马拉的战车,此处做量词使用。汉语中的量词十分丰富,而德语没有专门的量词类别。两译本均省去对中文量词“驷”的翻译,符合德语语言规范,体

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奇正”见于“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表示军队作战的变法和常法,强调用兵时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该词是中国军事典籍的核心概念,蕴含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统一思想,与西方“二元论”思维存在较大差异^[14],因而西方读者难以直接理解其深层含义。基于此,两译本采取归化策略,将“奇”译为“überraschend”(惊奇的),“正”译为“normal”(一般的)或“regulär”(有规律的),意译该兵学术语的核心内涵,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难度。

“夺气”见于“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势篇》),指打击敌人军队的士气。“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贯穿于儒家、道家等思想体系之中,内涵丰富多维。例如,孟子认为君子应有“浩然之气”,庄子的“心斋说”将“听之以气”划为认识的最高境界等。面对这一富含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两位译者均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结合具体语境,将“气”分别翻译为“Kampfmoral”(斗志、斗气)和“Moral”(士气,精神状态)。这种翻译方式把抽象又极具东方特色的“气”具象化,消弭了文化隔阂。然而,单纯的归化处理无疑舍弃了“气”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辨,让有意深挖中华文化的读者错失对“气”这一核心概念的全面认知。

3. 异化策略比较 如果说归化策略强调向目的语靠拢,异化策略则要求译者接受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向源语文本作者靠拢。两译本运用异化策略的对象不尽相同,整体而言,大中华文库译本的异化策略比率明显高于吕译本。从两译本对兵略类兵学术语“庙算”,兵器类兵学术语“驰车”、“革车”翻译处理中可见一斑,见表 7。

“庙算”见于“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计篇》)。大中华文库译本将其简单译为“rechnen”,该词在德语中仅指“计算”或“算账”,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语,缺乏“庙算”背后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未能传达出源语中的文化和历史深度。相比之下,吕福克巧妙地将“Tempel”与“Orakel”组成复合词“Tempelorakel”,通过将“庙”与“算”分别对应为“Tempel”(庙)和“Orakel”(预言、占卜),保留了该术语涉及的宗教性、仪式性以及文化象征。这种异化策略不仅

传递了术语的字面意思,还成功地将原文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引入德语语境,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意义。

表7 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译本中的异化策略示例

兵学术语	兵学含义	大中华文库译本	吕译本
庙算	出兵作战前,在庙堂商议谋划	rechnen	die Rechnungen des Tempelarakels
驰车	快速轻捷的战车	leichte Streitwagen	Kampfwagen
革车	重型作战车辆	schwere Streitwagen	Transportwagen

“驰车”、“革车”见于“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作战篇》)。“驰车”,曹操注“轻车也”,指快速轻捷的战车;“革车”,杜牧注“辘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指用来运输的辘重战车。大中华文库译本采用异化策略,直译为“leichte Streitwagen”(轻型战车)和“schwere Streitwagen”(重型战车),保留了中国传统作战工具的特色。吕福克则从其功能出发,在德语中寻找与之相匹配的交通工具,通过将驰车译为“Kampfwagen”(战车),革车译为“Transportwagen”(运输车),实现了该术语的本土化。

经过以上定性与定量分析,两译本在兵学术语翻译风格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在词汇丰富度上,吕译本大于大中华文库译本;(2)在词汇密度上,大中华文库译本大于吕译本;(3)在异化策略使用频率上,大中华文库译本大于吕译本。

五、翻译风格差异成因分析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深入研究翻译行为,必须精准把握译者以及译文背后所蕴含的影响因素。接下来,笔者将从翻译目的、译者以及赞助人三个方面探讨大中华文库译本与吕福克译本翻译风格差异的成因。

(一)翻译目的不同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其代表人物汉斯·弗

米尔(Hans Vermeer)指出,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对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15]。

大中华文库译本属于《大中华文库》多语种项目之一,该项目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进行中华文化经典外译的一项文化工程,也是向世界介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16],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脉,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因此,在翻译兵学术语时,该译本运用异化策略频次明显高于吕译本,力图保留兵学术语中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意象,尽可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吕译本作为在德国境内出版的书籍,其翻译目的在于提升译文的可接受性,使其更易于为西方读者理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读者。吕福克在“附录”中指出,异化虽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源语的精确性,但这种精确性更适合专业出版物,对于面向广大读者的译本并不适合^[7]。因此,在翻译兵学术语时,译者更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

(二)译者文化背景不同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文化背景与个人经历对文本阐释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诠释学理论,译者的“前理解”(Vorverständnis)由文化身份、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历时性要素共同构建,这种先在的认知框架必然渗透于文本的二次编码过程,因而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个人色彩。

大中华文库译本的主要译者钟英杰作为本土译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翻译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兵学术语时,该译本补充了大量背景信息,对兵学术语的描述更为详尽具体,词汇密度更高,体现出译者对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

与之相比,吕福克作为德语母语者,在运用德语词汇时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与熟练度。他在翻译用词的选择上更为多变,往往根据语境调整用词,提升了译本的词汇丰富度。此外,作为唐诗德译的代表人物,吕福克在翻译时常以诗句形式来保留某些兵学术语的押韵特征,体现出他对原文节奏与形式的重视。

(三)赞助人不同

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实质

上是对原作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改写,而这种体现译者翻译策略的改写受到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控。^[17]在翻译活动中,赞助人是指那些对翻译作品的产生、传播等过程施加影响的个人、群体或机构。其中,出版社作为极具关键性的赞助主体,其自身的定位以及所秉持的出版风格,均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大中华文库译本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主要出版优秀军事理论图书,以“军事题材、学术品位”为出版特色,致力于传承优秀军事文化、繁荣发展军事科学。因此,该译本在翻译兵学术语时更为严谨,尽可能全面精准地传达其内涵。

吕译本由德国岛屿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主要出版经典文学作品,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科学出版社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下属机构。其以出版“口袋书”闻名,这是一种德国人近年来颇为青睐的书籍形式,小巧便携,但篇幅往往受限。因此,吕译本的翻译更为简洁凝练,文本信息量相对较少,契合“口袋书”便捷阅读的需求。

语言随时代变化而持续演变,任何译本都只

是源文的近似表达,难以长久有效。在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长河中,典籍翻译始终面临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挑战。分析中华文化典籍的不同译本,既能揭示译本的多样性,也能为今后典籍翻译提供启示。

总体而言,大中华文库译本与吕译本在兵学术语的翻译路径和风格上各具特色。前者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注重多语对照和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后者则展现了德国译者从源语出发的文化解读与本土化传播的独特视角。这两种典型路径不仅丰富了《孙子兵法》的德语译本体系,也提升了该典籍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价值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典籍翻译正经历着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输出”的范式转型。兵学术语作为《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的精髓,其跨语际诠释的复杂性远超出军事概念的简单转码。在翻译兵学术语时,可采用“梯度异化”翻译机制,即核心术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次级术语视情况灵活调整。同时,鼓励中国译者从文化自主视角进行翻译,以源语文化为价值本位,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 [1]解文超. 先秦兵书研究[D].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
- [2]ANDRÄ-HAMPF C. Auf dem weg zum krieg von morgen. Chinesische Militärtheorie und die Evolution des Krieges[J]. SIRIUS-Zeitschrift für Strategische Analysen,2022(3):318-328.
- [3]向士旭.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兵学术语英译研究:以 Griffith 译本和林戊荪译本为例[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90-97.
- [4]苏桂亮.《孙子兵法》域外千年传播概说[J]. 滨州学院学报,2014(5):92-101.
- [5]苏桂亮.《孙子兵法》域外千年传播研究:以书籍流通为中心[J]. 滨州学院学报,2017(1):11-22.
- [6]钟英杰, Gregor Kneussel. 大中华文库:《孙子兵法》(汉德对照)[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
- [7]KLÖPSCH V. Die Kunst des Krieges[M]. Berlin: Insel Verlag,2022.
- [8]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9]郑侠.《孙子兵法》兵学术语英译研究:以林戊荪英译本为例[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5-117.
- [10]裘禾敏.《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11.
- [11]胡开宝,朱一凡,李晓倩. 语料库语言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 [12]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 语料库应用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13]胡开宝. 论异化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文化限定词的翻译[J]. 外语教学,2006(1):55-60.
- [14]王琰. 中国军事典籍核心概念在英美的翻译与军事诠释:以《孙子兵法》中的“奇正”为例[J]. 上海翻译,2024(3):89-94.
- [15]VERMEER H J, CHESTERMAN A.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M]//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2021.
- [16]杨牧之. 国家“软实力”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大中华文库》编辑出版启示[J]. 中国编辑,2007(2):22-27.

[17]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u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terms in *The Art of War*

—A case study of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Volker Klöpsch's version

XU Wenjuan, ZHANG Hua'nan

(Institute of Germanic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War* is the oldest and most complete existing military works in China, in which military science terms symbolize the Chinese military wisdom and influence the world's strategic philosophies. The Germa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Art of War*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10 years and presents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scene. Based on the corpus, this paper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 styles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of translation styles of military science terms in the version of *The Art of War* (Chinese—Deutsch) of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Volker Klöpsch's ver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xical richness, lexical density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erman transl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term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German; corpus; military science terms; translation styles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许文娟,张华南.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兵学术语德译研究:以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吕福克译本为例[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1):32-39.

XU W J, ZHANG H N.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terms in *The Art of War*: A case study of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Volker Klöpsch's versio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5, 42(1): 32-39.